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因素^{*}

——基于出口引致与出口平台的双重考察

王方方¹, 扶 涛²

(1. 广东商学院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320;

2. 中山大学 南方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70)

摘 要: 文章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伴随大量出口的现象, 判断中国 OFDI 可能存在出口引致与出口平台效应。文章利用 2003—2010 年 144 个国家及地区的面板数据, 考察了中国 OFDI 中的贸易因素, 研究得出: 中国 OFDI 的出口引致效应非常明显; 出口平台型 OFDI 在中国 OFDI 中发挥显著作用, 而且近年来呈现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东道国周边市场的不可控因素不会对中国在此东道国进行 OFDI 造成显著影响; 中国 OFDI 在高收入国家存在比较明显的集聚现象。文章认为, 中国 OFDI 应重视出口引致与出口平台的双重作用, 政府要合理引导企业实施贸易与投资混合国际化策略, 并构建投资网络化平台, 保障海外企业投资安全。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引致; 出口平台; 空间效应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952(2013)04-0090-11

一、引 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伴随着出口的快速发展增长, 中国经济常年保持了高速稳固的发展势头。同时, 近 10 多年来, 中国 OFDI 也逐年快速增长, 特别是相对于近几年国际经济的低迷态势, 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显著特征引起了中外各国包括政府、企业与学者在内的广泛关注。2011 年, 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退, 欧债危机又给全球经济带来一次重创, 国际在内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 中国企业出口面临极大挑战。因此, 中国如何在出口受创时大力发展 OFDI 显得十分紧迫。

商务部历年的《中国 OFDI 统计公报》显示, 中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进出口增长趋势显著。2009 年, 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478 亿美元, 其中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为 1 636 亿美元, 出口占 505 亿

收稿日期: 2013-01-23

作者简介: 王方方(1983—), 男, 河南平顶山人, 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讲师, 博士;
扶 涛(1979—), 男, 河南信阳人,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教授,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美元;到了 2011 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685.8 亿美元,其中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为 1 845 亿美元,出口总值增至 588 亿美元。这表明在中国历年 OFDI 增加的同时,其境外分支机构实现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呈现增长趋势,中国出口与 OFDI 可能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由中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发挥作用所致。

本文同时观察到中国 OFDI 另一现象,即存在 10% 以上的批发、零售型 OFDI,在各行业 OFDI 总量占比中稳固排在前三位,并且在近两年更有逐渐加大的趋势。^①这些以贸易为导向的流通型 OFDI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商品分销作用,其本质是中国出口企业为了进一步加大海外市场产品销售,而由出口引致的 OFDI。可以假定,中国 OFDI 存在出口引致效应,因此总体上表现为出口与 OFDI 保持长期的互补关系。

二、文献综述

以往的大量文献专注于研究 OFDI 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上替代还是互补关系的探讨。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对外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条路径上进一步探索:

第一,出口引致型(Export deriving)OFDI。Head 和 Ries(2001)发现,企业 OFDI 在整体上与出口呈现互补关系,源于企业具有将中间产品运输到海外分支机构进行成品生产的倾向,企业 OFDI 与出口呈现正相关关系。Hanson 等(2001)通过考察流通型(批发、零售)OFDI,发现在很大比例上企业会通过海外批发、零售型分支机构来实现对东道国仓储、配送、营销、售后等成本的节约,这总体上是以扩大对东道国出口为目的的 OFDI 活动。Krauthaim(2009)建立了贸易与投资模型,提出出口引致型 OFDI 在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双重作用,使一国 OFDI 与出口活动处于共同增长的互补关系中。Kleinert 和 Toubal(2010)基于企业异质性模型来区分企业海外机构的生产与流通职能,同样发现海外分支机构的批发、零售作用可以促使企业出口与 OFDI 同向增长。

第二,出口平台型(Export platform)OFDI。随着生产与分工的全球化,企业从事 OFDI 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即企业在海外某个东道国设厂投资生产后将产品出口到另外一个国家(Ekholm 等,2007)。与传统 OFDI 模式仅在东道国销售或返销母国不同,出口平台型 OFDI 强调 OFDI 战略决策中空间效应的重要性,对更复杂的企业 OFDI 活动进行了合理解释。例如,Hanson 等(2001)通过对美国的分析发现,美国海外企业大约 1/3 的 OFDI 都是通过海外分支机构再出口的方式进行的。Blonigen 等(2007)总结了不同 FDI 模式的空间效应,得出出口平台型 FDI 基于一个地区生产基地的建立,进而辐射周边地区市场,因此一个地区 FDI 与周边地区 FDI 的变动呈现负相关关系。谢杰和刘任余(2011)发现中国 OFDI 与对外贸易均受到“第三方效应”的

影响,而且贸易是投资的先导,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鉴于此,本文假定中国 OFDI 与出口存在长期的互补关系,以出口引致型与出口平台型 OFDI 的相关研究为基础,深入分析中国 OFDI 中存在大量出口的现象。本文研究的价值在于:研究出口引致型 OFDI 在中国 OFDI 中的重要作用,为出口与 OFDI 互补的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更加重视研究第三国出口对 OFDI 的影响,为引导政府政策与企业自身海外投资决策提供了启示。

三、样本与实证方法

(一)样本说明

本文选取的数据为 2003—2010 年中国与 144 个国家的 OFDI 流量、存量与出口额,其中对外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是万美元。中国 OFDI 流量与存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商务部 OFDI 数据统计公报,单位是百万美元。为了消除异方差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并尽可能使变量关系趋势线性化,我们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分别用出口对数值(LnExp)、OFDI 流量对数值(Lnofdiflow)和 OFDI 存量对数值(Lnofdistock)来表示。对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性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Exp	1 149	11.09753	2.368612	1.889083	17.15944
Lnofdiflow	1 152	1.496005	2.380609	-4.60517	8.966065
Lnofdistock	1 152	7.513085	2.949491	0	14.65892

(二)实证方法

本文通过建立面板 VAR 模型来处理中国 OFDI 与出口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关系。由于中国 OFDI 与出口变量并没有确定的相关关系理论基础,特别是在两者因果关系判断上还没有统一的模型设定,因此,可以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回归方法。Holtz-Ezkin 等(1988)最早将 VAR 方法应用到面板数据模型中,随后经 Arellano 和 Bond(1991)、Blundell 和 Bond(1998)等学者的的发展,已经成为兼顾时序与面板数据优点的成熟方法。假设变量 X_{it} 处于平稳过程,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X_{it} = \alpha_i + AX_{it-n} + \beta_t + u_{it} \quad (1)$$

其中, X_{it-n} 是 X_{it} 的 n 阶滞后项, A 为系数矩阵, α_i 是个体效应向量, β_t 是时间效应向量。 u_{it} 是随机干扰项,假设与 X_{it} 不相关。滞后期 n 的选择基于信息准则进行判断。同时,为了考虑中国 OFDI 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出口平台效应,本文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 OFDI 受到的第三方效应,具体模型与实证结果见下文。

四、中国 OFDI 的贸易因素(I)——出口引致考察

(一)平稳性检验与滞后阶数选定

在检验变量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之前,首先需要对该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基于本文面板数据呈现大 N 小 T 的特点,我们选择相应的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分别选取相同根单位根检验 LLC(Levin-Lin-Chu)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 Fisher-ADF 检验。同时,选取合理的变量滞后阶数也十分重要,因为滞后期过小会造成误差项严重自相关而造成参数有偏,滞后期过大又会导致自由度过小而影响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本文根据 AIC、BIC 与 HQIC 准则来判断变量的滞后阶数。检验与判定结果见表 2。

表 2 检验与判定结果

变量	平稳性检验		滞后阶数		
	LLC 检验	Fisher-ADF 检验	AIC	BIC	HQIC
lnExp	-20.9454*** (0.0000)	471.8953*** (0.0000)			
lnofdiflow	-14.4118*** (0.0000)	538.2573*** (0.0000)	2	1	1
lnofdistock	-3.2e+02*** (0.0000)	1 106.4748*** (0.0000)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检验统计量的 P 值。

表 2 中两种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显著拒绝了非平稳的假设,因此可以判断三个变量均为平稳变量,可以直接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与 Granger 因果检验。同时,三种准则报告的变量滞后阶数显示,AIC 准则选择 2 阶滞后,而 BIC 与 HQIC 选择 1 阶滞后。由于 BIC 与 HQIC 准则倾向于选择比较精简的模型,而 AIC 准则倾向于选择比较“丰满”的模型,因此前者判断通常优于后者。综合考虑,本文选择滞后一期来构造计量模型。

(二)中国 OFDI 的出口引致因素

基于以上检验的平稳性结论,我们直接对变量进行面板 VAR 模型估计,得出的回归结果相对来说会比较精准。估计结果见表 3,其中列(1)是全样本情形下的 VAR 模型估计结果,列(2)与列(3)分别从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角度对 VAR 模型估计结果的显著性进行检验。^②

从列(1)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与 OFDI 存量的滞后一期都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国 OFDI 受到中国出口引致的显著影响,中国出口值增加 1%,可以实现中国 OFDI 流量 0.78%的增加,意味着中国 OFDI 的出口引致效应非常明显,这与谢杰和刘任余(2011)、张如庆(2005)等得出的结论相同;同时,与谢杰和刘任余(2011)的结论一致,中国 OFDI 存量对中国 OFDI 流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中国 OFDI 会受到已经发生的中国 OFDI 的正向

表 3 面板 VAR 模型估计结果

	全样本 (1)	高收入国家 (2)	低收入国家 (3)
Lnofdiflow			
L.Lnofdiflow	0.067 (-0.83)	0.059 (-0.46)	0.059 (-0.68)
L.LnExp	0.780*** (-4.15)	0.708*** (-2.75)	1.046*** (-3.73)
L.Lnofdstock	0.230*** (-4.85)	0.338*** (-3.87)	0.014 (-0.16)
LnExp			
L.Lnofdiflow	0.004 (-0.08)	-0.033 (-0.34)	0.048* (-1.88)
L.LnExp	0.673*** (-4.46)	0.759*** (-3.14)	0.517*** (-5.14)
L.Lnofdstock	0.021 (-0.87)	0.037 (-0.74)	0.055 (-1.46)
Lnofdstock			
L.Lnofdiflow	0.026 (-0.73)	0.057 (-0.98)	-0.015 (-0.42)
L.LnExp	0.034 (-0.41)	-0.057 (-0.55)	0.239 (-1.44)
L.Lnofdstock	0.665*** (-15.78)	0.685*** (-12.27)	0.571*** (-6.28)
N	861	423	438
AIC	9.88	11.658	9.24
BIC	12.317	15.877	13.35
HQIC	10.813	13.325	10.862

注：***、**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检验统计量的 T 值。

牵引,意味着中国 OFDI 企业对准备进行 OFDI 的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因而存在比较明显的集聚现象。而滞后一期的 OFDI 流量不显著,意味着中国历年 OFDI 的流量与流向不存在显著的持续性,与先期的 OFDI 流量不存在牵引关系。同时列(1)结果显示,当出口与 OFDI 存量为因变量时,OFDI 流量在 10%水平上也不显著,表明 OFDI 流量对出口与 OFDI 存量均不产生显著的牵引效应,这与张如庆(2005)的结论相同,即中国出口对 OFDI 产生影响,但是 OFDI 对出口没有影响。

当对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单独进行考察时,列(2)与列(3)显示出与全样本一致的结果,意味着中国 OFDI 在不同收入水平东道国中均显示出比较显著的出口引致效应。这一结果也比较符合现实。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比较优势,中国的产品出口主要流向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出口外汇储备的积累与海外市场扩张的需要,许多企业加大了走向海外的步伐,在东道国特别是已经具有出口贸易网络的国家纷纷建立以批发、零售为主要形式的出口引致型 OFDI 分支机构,以促进企业出口增加与自身国际化能力提高。因此,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区分不同收入水平东道国,中国 OFDI 的出口引致效应都非常显著。

而低收入国家估计结果也显示出某些不同。首先,列(3)表明出口值增加 1%,可以带动 OFDI 流量增加 1.046%,意味着出口引致对中国 OFDI 产生的

效应更大。这说明中国 OFDI 在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出口影响,可以预测随着发达国家市场需求降低与贸易、投资壁垒提高,今后中国 OFDI 发展应该进一步挖掘在发展中国家的潜力。其次,OFDI 流量在 10%水平上对出口影响显著,表明在低收入国家中国出口与 OFDI 也存在一定的互动效应,但 OFDI 流量对出口的影响较小,系数仅为 0.048。最后,OFDI 存量对 OFDI 流量影响不显著,表明中国 OFDI 在低收入国家不存在比较显著的集聚效应。

(三)中国 OFDI 与出口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增强模型估计的可信度,需要进一步对中国 OFDI 与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以尽可能地排除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Chi 统计值	P 值	结论
LnExp 不是 lnofdiflow 的格兰杰原因	17.194***	(0.000)	拒绝原假设
lnofdistock 不是 lnofdiflow 的格兰杰原因	23.537***	(0.000)	拒绝原假设
lnofdiflow 不是 LnExp 的格兰杰原因	0.00592	(0.939)	接受原假设
lnofdistock 不是 LnExp 的格兰杰原因	0.75580	(0.385)	接受原假设
lnofdiflow 不是 lnofdistock 的格兰杰原因	0.53529	(0.464)	接受原假设
LnExp 不是 lnofdistock 的格兰杰原因	0.16874	(0.681)	接受原假设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 4 可知,检验在 1%水平上拒绝了中国出口(LnExp)与 OFDI 存量(Lnofdistock)不是中国 OFDI 流量(Lnofdiflow)的原假设,表明中国出口与 OFDI 存量都是中国 OFDI 流量的 Granger 原因;而其余两两变量之间都不能在 10%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中国 OFDI 不是中国出口的 Granger 原因,意味着中国 OFDI 与出口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些检验结果印证了表 3 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与可信度,也为下面中国出口影响 OFDI 流量的空间计量模型设定提供了依据。

五、中国 OFDI 的贸易因素(II)——出口平台考察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中国 OFDI 中存在流通型 OFDI,以及中国海外分支机构的出口比重逐年加大的现实,本文进一步假定中国 OFDI 可能存在一定的出口空间效应,即 OFDI 中有一部分是出口平台型 OFDI 所发挥贸易因素的结果。因此,本文将利用两种空间计量模型来探讨中国 OFDI 因出口平台因素而可能受到的空间效应影响。

1.空间滞后模型(SAR)

$$\text{Lnofdiflow}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LnExp}_{it-1} + \alpha_2 \text{Lnofdistock}_{it-1}$$

$$+\rho WLnExp_{it-1} + \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Lnofdiflow_{it}$ 表示中国在 t 年对 i 国的 OFDI 流量, $LnExp_{it-1}$ 表示中国在 t 年对 i 国的出口额, $Lnofdistock_{it-1}$ 表示中国在 t 年对 i 国的 OFDI 存量。空间变量 $WLnExp_{it-1}$ 表示影响中国 OFDI 的出口“第三方效应”, 空间滞后系数 ρ 的取值范围是 $(-1, 1)$, 用来度量中国 OFDI 的出口“第三方效应”大小。当 ρ 为正值时, 表示这个国家与周边地区接受中国 OFDI 存在互补效应, 反之则表示存在替代效应。而中国对周边地区出口的贸易因素正是传导效应发生的机制。我们利用 Queen 规则构造邻接矩阵来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W :

$$W_{ij} = \begin{cases} 1, i \text{ 与 } j \text{ 相邻} \\ 0, i \text{ 与 } j \text{ 不相邻} \end{cases}$$

其中, i 和 j 分别代表东道国, $i=1, 2, \dots, m, j=1, 2, \dots, n$ 。当 $i=j$ 时, $W_{ij}=0$, 因此空间矩阵的对角线元素为 0。空间矩阵可以表示为:

$$W_{ij} = \begin{pmatrix} 0 & \cdots & w_{1m} \\ \vdots & \ddots & \vdots \\ w_{n1} & \cdots & 0 \end{pmatrix}$$

2. 空间误差模型(SER)

本文还引入空间误差变量, 将方程转换为空间误差模型(SER)进行回归:

$$Lnofdiflow_{it} = \alpha_0 + \alpha_1 LnExp_{it-1} + \alpha_2 Lnofdistock_{it-1} + \epsilon_{it}, \epsilon_{it} = \lambda W\epsilon_{it} + \mu_{it} \quad (3)$$

其中, λ 是重点关注的空间误差系数, 取值范围同样是 $(-1, 1)$ 区间。它反映的是影响东道国周边地区 OFDI 的不可控因素对此东道国投资的影响程度, λ 越大表明这种周边地区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越大, 反之则越小。模型中空间权重矩阵 W 的构造方法同上, 其他变量的含义同模型(2)。

本文基于 Stata 12.0 中的扩展命令 `spweight` 所构建的空间矩阵来进行计量分析。此命令存在矩阵大小最高限制约束, 不能构建本文需要的 $(144 \times 8) \times (144 \times 8)$ 分块矩阵。鉴于本部分重点在于考察中国出口的空间效应对中国 OFDI 是否存在影响, 对在时间上是否存在变化或差异相对于上文则不太关注, 因此采取折中方法, 将权重矩阵 W 构造成 144×144 的方阵, 以各个变量在不同年度区间内取平均值进行回归。

(二) 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模型(2)与模型(3)的设定, 本文对中国 OFDI 流量所受的出口空间效应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5, 其中列(1)呈现的是 2003—2010 年全样本区间的估计结果。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在回归中还分段进行了显著性检验。^③

首先关注核心变量系数:(1)空间滞后变量的总体影响。 ρ 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出口平台型 OFDI 在中国 OFDI 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由于本

表5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模型	2003—2010年 (1)		2003—2006年 (2)		2007—2010年 (3)	
	SAR	SEM	SAR	SEM	SAR	SEM
Constant	-2.828*** (-5.540)	-2.962*** (-6.188)	-1.118* (-1.720)	-1.161* (-1.820)	-4.195*** (-7.268)	-4.347*** (-7.742)
LnExp	0.099* (1.796)	0.104* (1.890)	0.074 (1.053)	0.073 (1.035)	0.113** (2.137)	0.121** (2.322)
Lnofdistock	0.498*** (8.307)	0.493*** (7.965)	0.287*** (4.700)	0.285*** (4.660)	0.658*** (9.829)	0.652*** (9.721)
ρ	-0.039* (-1.859)		-0.007 (-0.222)		-0.034*** (-2.646)	
λ		0.011 (0.909)		-0.013 (-0.610)		0.014 (1.643)
R ²	0.7222	0.7166	0.5240	0.5221	0.8040	0.7980
Adj.R ²	0.7202	0.7146	0.5207	0.5187	0.8026	0.7965
N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F	183.28	178.26	77.62	77.01	289.18	278.44
Log-likelihood	-1 913.88	-1 929.26	-1 682.48	-1 680.55	-2 019.68	-2 035.54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检验统计量的T值。

文重点关注的是向周边地区出口的空间效应对本地区 OFDI 的影响机理, ρ 为负意味着中国对海外某国 OFDI 水平与对周边地区出口水平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具体来讲,如果中国对一个国家周边地区的直接出口水平较低时,则对这个国家的 OFDI 水平较高,反映了此时中国企业倾向于将此国家作为对周边地区进行大量出口的“平台”。这与 Blonigen 等(2007)的结论一致,即出口平台型 FDI 是企业混合型国际化战略的表现之一,企业往往基于一个东道国生产基地,通过出口方式来辐射周边地区市场。相反,如果中国对一个国家周边地区的直接出口水平较高,则出口引致的 OFDI 水平在周边地区也较高,这时中国企业暂时不需要这个国家作为出口的“平台”,因此对这个国家进行 OFDI 的水平较低。(2)空间滞后变量的分段检验。2007—2010 年中国 OFDI 中的出口平台特征更加明显,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国跨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其海外国际化的模式更加多样化,表现为企业混合战略性国际化能力逐步提高,更注重出口与 FDI 方式的灵活运用,最大程度上避免东道国对中国在出口与 FDI 上的双重壁垒。(3)空间残差因素影响。无论在哪一个样本区间进行估计, λ 均在 10%水平上不显著,表明周边地区市场的不可控因素不会对中国在某个东道国进行 OFDI 造成显著影响。这也从侧面表明中国 OFDI 除了关注周边市场出口的空间作用之外,并没有对宏观基本面进行系统考察,缺

乏对周边地区投资不可预测因素的监控,从而增大了中国 OFDI 的潜在长期风险。

再来观察传统变量的影响。列(1)中,无论是 SAR 模型还是 SEM 模型,出口变量在 10%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出口对 OFDI 产生了正向效应,这与第四部分的 VAR 模型回归结果相同;但分段估计结果显示,2003—2006 年出口在 10%水平上不显著为正,而 2007—2010 年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与国际化形式的灵活多样,出口引致 OFDI 所展现的国际化动机日益明显。同时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OFDI 存量在三个估计区间都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 2007—2010 年的系数相对更大,表明中国企业近年来的 OFDI 活动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集聚效应。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发现中国历年 OFDI 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存在大量出口的现象,特别是批发、零售等流通型 OFDI 对进一步加大海外市场产品销售起到了关键作用,总体上表现出 OFDI 与出口长期互补关系。本文分别从出口引致与出口平台两个层面考察中国 OFDI 中的贸易因素,得出以下结论与政策启示:

(1)中国 OFDI 的出口引致效应非常明显。中国 OFDI 在不同收入水平东道国中均具有显著的出口引致效应,其中在低收入国家表现出 OFDI 与出口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今后国家应鼓励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在东道国特别是已经具有出口贸易网络的国家建立以批发、零售为主要形式的出口引致型 OFDI 分支机构,以促进企业出口增加与国际化能力提高。

(2)出口平台型 OFDI 在中国 OFDI 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表现为中国对海外某东道国 OFDI 水平与对周边地区出口水平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可以认为近年来的国际经济危机促使中国企业以 OFDI 的形式参与海外市场竞争,最大限度地弥补了贸易壁垒增加情况下的出口损失。因此,政府应该引导企业注重出口与 OFDI 模式的灵活运用,从而适应海外市场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步提高自身的混合性国际化战略水平。

(3)周边地区市场的不可控因素不会对中国在某个东道国进行 OFDI 造成显著影响,表明中国 OFDI 除了关注周边市场出口的空间作用之外,缺乏对周边地区投资不可预测因素的监控,增大了中国 OFDI 的潜在长期风险。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建立海外安全机制,建立有效的海外保险制度;同时,企业也要增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服务。

(4)中国 OFDI 存在比较明显的集聚现象。这意味着今后企业海外投资

的政策引导方向是加快建立海外中国企业联盟,发挥中国企业国际化投资组织平台的作用。特别是在准备投向发展中国家时,需要重视团结当地的华人华侨力量,利用商业网络化关系,尽可能地降低自身 OFDI 的潜在风险,同时也能够挖掘潜在的商业机遇。

* 本文受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项目(2013XM17)资助。

注释:

- ① 历年的详细统计数据见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 ② 划分收入高低的依据遵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划分标准。
- ③ 两段时期的划分依据是,2007 年之后,随着中国 OFDI 尤其是金融类 OFDI 的快速增长,中国商务部进行数据统计时,将金融类 OFDI 与非金融类 OFDI 合并在一起进行统计。

参考文献:

- [1] 谢杰,刘任余.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贸易效应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6):66—74.
- [2] 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3):23—27.
- [3] Arellano M, Bond S.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 (2): 277—297.
- [4] Blonigen B A, Davies R B, Waddell G R, et al. FDI in space: Spatial autoregressive relationship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 51 (5): 1303—1325.
- [5] 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 115—143.
- [6] Ekholm K, Forslid R, Markusen J R. Export-platfor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7, 5(4): 776—795.
- [7] Hanson G, Mataloni R J, Slaughter M. Expansion strategies of U.S. multinational firms [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 [8] Head K, Ries J.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irm export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9(1): 108—122.
- [9] Holtz-Eakin D, Newey W, Rosen H. Estimat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s with panel data [J]. Economica, 1988, 56(6): 1371—1395.
- [10] Kleinert J, Toubal F. Production versus distribution-oriented FDI[C]. Université Paris1 Panthéon-Sorbonne (Post-Print and Working Papers) No. hal—00608510, 2010.
- [11] Krauthaim S. Export-supporting FDI[C]. Deutsche Bundesbank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 Economic Studies 2009.

Trade Factor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al Research Based on Export-arisen and Export-platform Effects

WANG FANG-fang¹, FU Tao²

(1. *Nat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2. *Nanfang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97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nds that Chinese OFDI accompanies a large number of exports, so it proposes that Chinese OFDI might arise from export or be an export platform.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44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2003 to 2010, it studies the trade factors of Chinese OFDI, and reaches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export-arisen effect of Chinese OFDI is very significant; secondly, the export-platform OFDI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OFDI, and the trend further strengthens in recent years; thirdly, the uncontrollable factors of neighboring markets of a host country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inese OFDI into this host country; fourthly, Chinese OFDI is featured by obvious agglomeration in host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This paper states that Chinese OFDI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ual export-arisen and export-platform effects. Chinese governments should reasonably guid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a mixe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and establish a platform of investment network to protect the investment safety of overseas enterprises.

Key wor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port-arisen effect; export platform; spatial effect

(责任编辑 周一叶)